

# 试论汉魏之际北方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薛海波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汉魏之际, 土豪彻底成为曹魏官僚体制的一分子, 而士大夫豪族却凭借其文化特质在曹魏的官僚体制中占有优势, 在曹魏统治政策由武到文的转变中, 实现了士族化世代主导曹魏的官僚体制, 最终建立了士族主导的西晋政权。

**关键词:** 官僚体制; 豪族; 曹魏统治; 西晋; 士族化

**中图分类号:** K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2010)01-0128-04

—

东汉末年的黄巾暴动, 沉重地打击了东汉地方统治秩序, “所在燔烧官府, 劫略聚邑, 州郡失据, 长吏多逃亡”。<sup>①</sup> 随后, 以董卓为代表的凉州豪族集团进入洛阳, 用暴力将东汉朝廷的权威彻底摧毁。因此, 作为在当时社会最具势力和政治影响的士大夫豪族和土豪阶层, 围绕着官僚化和士族化而展开的激烈斗争, 随着东汉国家统治体制的崩溃而失去了意义。由于双方在武装力量、文化层次上的差距, 使得汉魏之际北方豪族的政治发展呈现两种特征: 对于宗族武装力量较强的土豪而言, 主要是抓住国家统治崩溃的机遇, 实现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控制, 进而结成了地域性豪族军事集团, 在不知不觉中又为魏晋集权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对具有文化优势的士大夫豪族而言, 由于武装力量弱, 只好投附于不同的土豪军事集团, 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其政治地位的国家政权。

东汉末年的大规模战乱, 使地方土豪在乡里长期积聚的武装势力得以凸现, 如泰山鲍信为了讨伐董卓“还乡里, 收徒众二万, 骑七百, 輜重五千余乘”。<sup>②</sup> 土豪依靠宗族武力成为地方基层社会秩序的支配者, 如曹仁“少好弓马弋猎。后豪桀并起, 仁亦阴结少年, 得千余人, 周旋淮、泗之间”<sup>③</sup>, 许褚“汉末, 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 共坚壁以御寇”, 并很快拥有地域性的政治权威“由是淮、汝、陈、梁间, 闻皆畏惮之”<sup>④</sup>。土豪成为当时地方政权的实际控制者, 如黄巾暴动时, 东阿程昱和县中大姓薛房等控制了东阿县城。<sup>⑤</sup> 董卓之乱时, 河南中牟任俊借助宗族武装, 支持县令杨峻擅自代行河南尹的职权, 控制了河南尹所辖大部分的县城。<sup>⑥</sup> 由于地方官需要借助地方土豪来维持秩序, 因此土豪纷纷被任命为地方官吏, 如河内韩浩“汉末起兵, 县近山藪多寇, 浩徒众为县藩卫。太守王匡以

作者简介: 薛海波,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吉林省高句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① 《后汉书》卷 71 《皇甫嵩传》

② 《三国志》卷 12 《魏书·鲍勋传》注引《魏书》。

③ 《三国志》卷 9 《魏书·曹仁传》

④ 《三国志》卷 18 《魏书·许褚传》

⑤ 《三国志》卷 14 《魏书·程昱传》

⑥ 《三国志》卷 16 《魏书·任峻传》

为从事”<sup>①</sup>。因此在统治体制瘫痪、大小土豪竞起的形势下，各地的地方官员为了保住官位，只能聚集在土豪的政治号召之下，如广陵豪族臧洪靠其政治权威将江淮地区的豪族和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联结在一起，结成了以其为领袖的松散的讨董联盟，“乃设坛场，方共盟誓，诸州郡更相让，莫敢当，咸共推洪”<sup>②</sup>。然而以臧洪为领袖的讨董联盟，由于联盟内部缺少实质的较为牢固的政治社会联系，在袁绍的讨伐下很快崩溃。这说明靠与在当地没有多大实力的地方官员结成联盟没有实质的意义。

然而单一的以宗族为基础的土豪共同体，虽然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无法应付残酷的战争形势，为了自保和壮大自身的武装势力，土豪在各自经营的基层社会基础上，纷纷建立起联系紧密的地域性的土豪联合体。如青徐豪族就以臧霸为中心结成了力量强大的联合体，据《三国志》卷18《魏书·臧霸传》载：“（臧霸）泰山华人也，以勇壮闻。黄巾起，霸从陶谦击破之，拜骑都尉。遂收兵于徐州，与孙观、吴敦、尹礼等并聚众，霸为帅，屯于开阳。”而臧霸成为青徐土豪军事共同体首领，曹操对其都不敢轻视的原因在于，臧霸能为其属下各土豪提供生存上的庇护，即双方是通过“义”，而不是像臧洪靠讨伐董卓那样较为虚无的政治口号结合在一起。

## 二

就最终统一北方的曹操而言，其武装力量的核心形成就是由最初的单一宗族乡里武装，扩大到其政治影响所及的地域豪族。

曹操起兵时是以曹氏宗族为主体，如从弟曹仁、曹洪，附以乡里宗族如曹（秦）邵、夏侯惇、夏侯渊为主体。随着曹操军事势力所及地域的扩大，谯沛及其周边地区的豪族逐渐加入到曹操集团之中，如谯国许褚“太祖徇淮、汝，褚以众归太祖”<sup>③</sup>。如河南中牟任峻“会太祖起关东，入中牟界，众不知所从，峻独与同郡张奋议，举郡以归太祖。峻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愿从太祖”<sup>④</sup>；又如山阳巨野李乾（李典从父）“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众随太祖”<sup>⑤</sup>。任城吕虔“太祖在兖州，闻虔有胆策，以为从事，将家兵守湖陆”<sup>⑥</sup>。从而使曹操靠其谯沛豪族集团的宗族武装力量战胜了当时北方的各武装集团，如黑山军、青州黄巾、张绣、吕布、袁术、袁绍等豪族集团，统一北方。

曹操统一北方实际是将包括谯沛土豪在内的各地豪族集团纳入到国家体制的过程。

在通过姻亲和宗族乡里关系，乃至他个人权威结合起来的曹操军队当中，其指挥体制主要是各土豪将领自行指挥其私人宗族武装，一旦战事不利就会有迅速崩溃的危险，因此将握有私人军队的土豪纳入国家体制是曹操建立国家政权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土豪国家化的过程就是其私人武装变为国家军队，个人变为官僚的过程。初平三年（192）曹操在兖州，受降黄巾30万，家属百余万口，挑选其中精锐，组成青州军，实行世兵制，为曹魏建立强大的国家军队奠定了基础。建安九年（204），曹操开始将其属下各土豪将领及其所属私人宗族武装成员的家属迁至邺城，留作“质任”，进而将其私人武装变为国家的直辖军队。在曹操强大的直辖军队（如青州兵）和曹氏宗族所掌握的武装的震慑下，各土豪将领只好主动将家属宗族送作“质任”。如李典，“宗族部典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纯邪？’典谢曰：‘典弩怯功微，而爵宠过厚，诚宜

① 《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惇传》注引《魏书》。

② 《三国志》卷7《魏书·臧洪传》。

③ 《三国志》卷18《魏书·许褚传》。

④ 《三国志》卷16《魏书·任峻传》。

⑤ 《三国志》卷18《魏书·李典传》。

⑥ 《三国志》卷18《魏书·吕虔传》。

举宗陈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实郊遂之内，以制四方，非慕纯也。’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邨”<sup>①</sup>。又如臧霸在投靠曹操后也“因求遣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诣邨”<sup>②</sup>。田畴在协助曹操陆续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之后，尽将其家属及宗人300余家居邨。<sup>③</sup>在私人宗族武装变为国家军队后，土豪失去了自立的基础，要保住政治地位只好被纳入到曹魏的官僚化之中。如《三国志》卷18《魏书·许褚传》载：“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太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即使在青州有很强影响力的泰山臧霸、臧艾父子两代执掌青州的军政大权后，仍然逃脱不了在国家的力量主导之下中央化、脱离乡里的过程，两人的最终官职均是被征调为执金吾、少府<sup>④</sup>，成为官僚体制中的一份子。又如江夏土豪李通“以侠闻于江、汝之间”。建安初，李通举众投靠曹操，成为曹操手下的战将，随后其子孙在曹魏历任中央官和地方官，实现了官僚化，至其曾孙李重时“以清尚称”，初步具备了士族的特质。<sup>⑤</sup>

土豪被纳入国家体制实现了官僚化后，很快就表现出作为国家官僚“公”的一面。据《三国志》卷18《魏书·李通传》载：“建安初……以（李）通为阳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长赵俨收治，致之大辟。是时杀生之柄，决于牧守，通妻子号泣以请其命。通曰：‘方与曹公戮力，义不以私废公。’嘉俨执宪不阿，与为亲交。”

在汉魏之际由于士大夫豪族自身的文化特质，缺少武装势力和战阵经验，无法独自起事称雄一方。只好就近托庇于或成为某个土豪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使各土豪集团在吸纳士大夫豪族时也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如武威贾诩投附的就是以董卓为代表的凉州豪族集团，最初是投附董卓，又投李傕、再投段熲、最后投张绣直至建安五年（200）张绣被曹操击败。荆州士大夫豪族则是团聚在占领荆州的刘表的周围。处于混战地区的淮泗士大夫豪族，为了宗族乡里的利益安危，最初往往举宗迁往他地避乱。如河内司马朗，“（河内）此乃四分五裂战争之地，难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举宗东到黎阳’……惟同县赵咨，将家属俱与朗往焉”<sup>⑥</sup>，又如颍川荀彧“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彧独将宗族至冀州”<sup>⑦</sup>；河内温人常林率领宗族避难上党；<sup>⑧</sup>杨俊“以兵乱方起，而河内处四达之衢，必为战场，乃扶持老弱诣京、密山间，同行者百余家”<sup>⑨</sup>。然而单一的迁徙他地既无法保障其宗族安危，又为当地的士大夫豪族所不容，如在占领河北的袁绍集团内部，本地的河北士大夫豪族审配、逢纪等与辛评、郭图等颍川士大夫豪族冲突不断。因此处于东汉士大夫豪族核心地位的淮泗士大夫豪族集团，最终只能返乡投靠占领当地的曹操集团。荀彧“初平二年（191），彧去绍从太祖。太祖大悦曰：‘吾之子房也。’以为司马”<sup>⑩</sup>；颍川杜袭“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许。袭逃还乡里，太祖以为西鄂长”<sup>⑪</sup>。司马朗在返乡后被“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成皋令”<sup>⑫</sup>。东汉末年的淮泗士大夫豪族虽然武力不强，但他们具有全国性的社交网络和政治影响力，献帝迁许以后，曹操大批进用由荀彧举荐的颍川名士。平邨之后又靠冀州高门清河崔琰来网罗当地名士。<sup>⑬</sup>因此士大夫豪族在曹操政权中的势力发展很快，至魏国时期外朝的台阁中大多数文官都是荀彧、崔琰引用颍川、

① 《三国志》卷18《魏书·李典传》注引《魏书》。

② 《三国志》卷18《魏书·臧霸传》。

③ 《三国志》卷11《魏书·田畴传》注引《先贤行状》。

④ 《三国志》卷18《魏书·臧霸传》注引《魏书》。

⑤ 《三国志》卷18《魏书·李通》注引王隐《晋书》、《晋诸公赞》。

⑥ 《三国志》卷15《魏书·司马朗传》。

⑦ 《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⑧ 《三国志》卷23《魏书·常林传》。

⑨ 《三国志》卷23《魏书·杨俊传》。

⑩ 《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⑪ 《三国志》卷23《魏书·杜袭传》。

⑫ 《三国志》卷15《魏书·司马朗传》。

⑬ 毛汉光：《三国政权的社会基础》，载《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北海士大夫豪族,<sup>①</sup>几乎在曹魏的行政体制中已居于主导地位。士大夫豪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广泛控制农村,文化上几乎处于垄断地位<sup>②</sup>,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步安定,士大夫豪族在地方上的势力逐渐得以恢复,控制了社会基层。

### 三

由于士大夫豪族势力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威胁到曹操所代表的土豪武将阶层的政治地位,因此在官渡之战取得在北方的绝对优势下,曹操为了抑制政权中士大夫豪族政治力量的上升,先后在建安八年、十五年、十九年三次发布求贤令,主张“唯才是举”选拔土豪进入官僚体系。然而曹操“唯才是举”仅是其统治时期用人原则中的重要一点,土豪的选拔仍要靠士大夫豪族的推荐。

随着曹操的逝世,在士大夫豪族掌握行政权和乡论的条件下,在被颍汝士大夫豪族集团拥戴,且早已士大夫化的曹丕当权的条件下,“唯才是举”的方针便不可能长久维持。<sup>③</sup>同时在曹操时代形成的士大夫豪族掌管行政,谯沛土豪掌握军权的分权体制,由于此时的三国鼎立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曹魏国家的政治体制自然要由军人掌权转而实行政官政治。此时谯沛土豪伴随着世代交替,日益显示出无法承担国家军政重担的颓势,因此要求重视乡论,改变谯沛土豪掌握实权、士大夫豪族受钳制的政治体制在曹操去世之后的呼声高涨,“太祖崩洛阳,群臣入殿中发哀。或言可易诸城守,用谯、沛人。(徐)宣厉声曰:‘今者远近一统,人怀效节,何必谯、沛,而沮宿卫者心。’”<sup>④</sup>

魏文帝曹丕也只好适应此形势,在东汉末年士大夫豪族主导乡论,向国家举荐人才的惯例加以制度化,即汉延康元年曹丕采用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初创之时,以“家世”、“才”、“德”并重。<sup>⑤</sup>而“家世”和“才”、“德”均与儒学有着密切联系,因为不通儒学无谈才德,而无才德遑论家世。因此选官重儒学,成为曹魏文明两帝为了保证九品中正制实施的重要条件。经过文明两帝选官政策的转变,士大夫豪族子弟在将相大臣、方镇、典农等方面的人数大增,而武将及土豪出身的人数大减。<sup>⑥</sup>至嘉平四年(252),士大夫豪族占据了中央和地方的各主要官职,彻底控制了曹魏政权。<sup>⑦</sup>泰始元年(265),司马炎代魏建西晋全面确立了士大夫豪族的统治地位。

责任编辑:尚永琪

①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芑、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②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8页。

③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83、26页。

④ 《三国志》卷22《魏书·徐宣传》。

⑤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8页。

⑥ 熊德基:《曹操政权的阶级性质及其入魏后之变质与灭亡》,载《六朝史考实》,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7页。

⑦ 《晋书》卷2《景帝纪》。